

從魔笛手到伯恩斯坦之路

郭聯昌

沒有有音樂的生命無法想像，沒有聲明的音樂流於學究氣。
所以說，我與音樂的接觸是一種全面的擁抱。——Leonard Bernstein

我是東吳第六十七級的畢業生。記得剛進東吳的時候，新的音樂系館才剛剛興建完成。我們的系館在二十幾年前算是非常摩登的；舊的系館我都沒有見過，因為民國六十三年時剛好系館「搬家」，位置應該是在超庸館的下面，跟現在都不一樣了。我是音樂系第三屆的學生；那時的課程，因為是早期，所以課程比較沒有上軌道。不過也是因為這樣，我們就有很多的時間去作我們想做的事，無形中也有了更多的發展空間。我主修的是長笛，副修鋼琴。但是由於課程安排的都滿輕鬆，所以我就利用時間也自學了低音提琴。就靠著這些，我獲得了一些機會與學校外面的樂團接觸。

那個時候課程安排規定每一位大二的同學必須選修一項中國樂器。而我選了與長笛較接近的中國笛。當時教我們「國樂概論」的老師是李鎮東先生，他是中廣國樂團負責訓練的首席胡琴；由於我自學的低音提琴基礎還不錯，國樂團裡正需要類似這個聲音的倍革胡，老師就推薦我和現在復興劇校的鄭榮興校長一起加入中廣國樂團。當時我們的導師曾任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系主任的徐頌仁教授，在幾乎同一時期內他也介紹我到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那時還是兼任團員。在國樂團前後待了一年多，後來發現國樂和西樂畢竟有差異，而且我還是學生，學校的方向還是以西樂為主，所以就暫時離開了國樂團，專心留在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了。後來十年後又再度回到國樂團，而且是我自法國回國的第一份工作，這卻又是後話。

二十幾年前主修管樂的人比較少，多半的人都是主修聲樂和鋼琴的。我們音樂系一直到我們這一屆才有比較多人修管樂、還有少部分的弦樂。當年我們班三把小提琴，只有一把是主修，其中之一後來成為我太太——她是我們同班同學。當時班上修弦樂的人數雖然可以勉強組成一個小樂團，但是卻還沒有合奏課程，也許是因為一切都還在起步階段的緣故。所以我就自己發起號召組了一個小小的弦樂團，找幾首曲子練一練；這團大概有十幾個人，我一面指揮一面吹長笛，演奏給當時的老師聽，然後就像現在的「請願」一樣，申請開合奏課。大二時課開成了，老師是當時一位美國宣教士，當時教會勢力還深深影響著學校，用的教材也是美國的一些民謠，滿粗糙的。不過由於常在喊東喊西的，自己就當上了這個團總幹事。除了這個以外，在高中時

參加台中一中的管樂團有一些經驗，因此我也鼓吹在東吳用社團名義組織了一個管樂團，那是以音樂系為主的。後來也被改為音樂系的正課了。當時也沒有老師，我就自己上台指揮，校慶等慶典活動也都擔任負責工作。其實管樂團的好處就是沒有時空的限制，婚喪喜慶都用的上。還因為這個，大四畢業那一年還得到學校頒發的「服務熱心」獎呢！

想想當時大三、大四的時候真的一個人身兼好多團。除了中廣國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還有大四那年有一個「幼獅管樂團」也徵召我去，還有兩團合奏課。我的東吳印象幾乎就在這些團裡面轉來轉去……但仔細算一算，國樂團、管樂團、管弦樂團我通通都接觸了，所以可以說東吳的環境再加上我對音樂的酷愛，過去經驗的累積，都一點一滴的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

至於畢業以後在國防示範樂隊服役，因為地點就在台北，常常被徵召去救國團的「幼獅管樂團」幫忙，跟音樂也脫不了干係。當時這個幼獅管樂團就像國家代表樂隊一樣，我是第一屆的團員。六十六年成立的時候，指揮是張大勝老師。六十九年一月的時候，指揮已經換成我高中時代的恩師陳澄雄老師。他當時就徵召我到幼獅去當他的助理指揮，那時我都還沒退伍呢。也因為和陳老師的接觸，六十九年四月的時候，陳老師推薦我參加法國文化科技中心一項公費留學獎學金的考試，考的專業科目是指揮。我想是因為自己在學校的那段日子裡有許多指揮方面的磨練，加上陳老師也鼓勵我朝這個方向發揮，大學時代的徐頌仁老師也都來幫忙……經過重重關卡，雖然我八月才正式退伍，但是四月就考上了公費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深造，雙主修指揮和長笛。

要去法國，但是當年我一句法文都不會，於是只得趕緊補習。四月到八月我還在服役期間，只得一放假時就找家教來為我補習，十月的時候我就出國了。

想想在東吳四年到當兵退伍的這一段時間，真的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這短短的幾個月裡面我畢業、退伍、結婚、出國。從大一下追求我的太太，一直的出國前結婚，我們愛情長跑了五年半；我赴法國留學一年以後她才跟著到法國去的。這中間的過程真的相當漫長，不過我們倆可以一同走來，現在想想也是不容易，看看現代男女的愛情，能夠走的長久的有幾多？

當時法國人，對台灣所知甚少（可能是因為台灣太小了吧）。為了讓他們有清楚一點的認識，因此到了法國四、五年，我就組織當地的華人、留學生共同組成一個「國際管弦樂團」。我擔任總監兼指揮，在當地有無數場的演出，並把當時台灣作曲界前輩郭芝苑先生的中國輕歌劇《牛郎織女》搬上法國舞台。啊，那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把中國文化在當地推廣，也算是一項創舉了！

我在法國待了六年三個月又十五天，雖然只有頭一年領著法國文化科技中心的獎學金，但是接下來的每一年學費方面申請不同的獎學金支持，都還過得去。靠著演出、交流和教學，我太太和我一同努力，在法國也算是小有成績了。不過異鄉總是異鄉，想回國的念頭是一直有的。我從巴黎師範音樂學院畢業以後，留在法國吸取「實務經驗」二年，後來因為獲得「台北市立國樂團」的聘書，就高高興興的回來了。

陳澄雄老師一九八四年三月接掌「台北市立國樂團」的團長，他寫信給我，希望我回國服務。其實十二年前要回國找工作就已經滿困難的，留學生的增加，造成所謂「留學生症候群」就是說出國後回國找工作的人越來越多，缺額有限。但是因為老師當時是用人之際，他也知道我能做一些事，能夠帶動，所以還是毅然決然的邀請我回來。老實說那時回來有很多的壓力。一方面自己是在國外學指揮的，學的又是西樂，離開國內也有六年多。現在突然回來，而且又是帶「國樂團」！不知道會不會有不好的意見或是批評。加上這個團裡有一些團員是我的舊識。那時候心裡滿忐忑的：有舊識，可以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因為如果和他們的關係不好，現在可就糟了！人際關係處理的好的話，現在就可以是我的「介紹人」。還好自己在社團經驗或者做人處事上沒有什麼遭人非議之處，自己在回國服務的第一個工作，算是平安過關了。

「台北市立國樂團」當時事一個公家行政單位。公家單位對於人員對外演出有諸多限制，還有就是除了本團演出以外必須堅守「公務人員不得兼差超過四小時」的規定，因此當長輩或者學生時代的舊識找我帶團或在學校兼課時都很不方便。就這樣，後來我就結束了在市立國樂團的指揮工作，投身國內的教育及音樂文化推廣工作一直至今。

在法國待過一段時間，一直到回國教學，老覺得其實在音樂方面是可以「中樂為體，西樂為用」的，先傳統再創新。所以說，能夠在自己的這塊土地為中國人做一些事是好的，能夠為國內的音樂教育出一份力是好的，能夠為國內與國際做音樂交流是好的。也希望我們的努力有一天有收穫！

（採訪整理／吳芃影）

郭聯昌，東吳大學音樂系六十七級畢業、巴黎師範音樂學院高級指揮科，曾任巴黎市國際管弦樂團總監兼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幼獅管樂團指揮，也多次獲得教育部所頒特優演奏、教育、社會貢獻獎項。現任輔仁大學音樂系所專任教授兼主任，並指揮該系交響樂團及管樂團。

註：2019年8月自輔大音樂系退休。目前尚在輔大、台東大學、台南應用科大等音樂系兼任並指揮國防部示範樂隊管絃樂團、海軍樂隊及任台北市民管樂團音樂總監。